

從國科會傳播專題計畫提案看 學門發展生態：1966-2000年*

陳百齡**

《摘要》

國家科學委員會（國科會）的專題計畫補助，是國內傳播學者從事基礎研究最主要的經費來源。本研究自電腦資料庫中萃取樣本進行分析，旨在探討國內傳播科系教師參與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補助的概況。

結果發現，近五年來傳播學門專題研究數量呈現高度成長，參與研究的人員數量日趨增加，內容主題也逐漸走向多元發展。然而，國內傳播學術社群成員參與國科會補助仍存在若干落差、研究主題過於偏向行政和商業應用、以及缺乏團隊合作的現象，值得社群成員注意。

關鍵詞：國科會、傳播專題研究、資料庫分析、傳播教育

投稿日期：2000年9月18日；通過日期：2001年1月3日。

* 本文初稿曾於中華傳播學會年會2000年年會（台北：深坑，6月26-7日）發表。作者感謝政大新聞系陳世敏教授促成本文寫作、翁秀琪教授參與內容討論、研究生吳文琴、黃瑞斌、董高志協助整理資料、以及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處紀憲珍小姐提供檔案資料。年會評論人鄭瑞城教授的評審意見、以及《新聞學研究》兩位匿名評審、編輯委員會所提供之意見，對本文之修改極有助益，專此敬致謝忱。

** 作者現為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副教授。E-mail: blchen@nccu.edu.tw

壹、前言

公元兩千年，國科會將過去五年獨立列為學門的傳播領域、重新歸屬到社會學門之下。領域被歸併的挫折、和學門長久以來的危機感相結合，引起傳播學術社群成員的議論紛紛。許多場合常引為話頭的一個議題，便是「傳播學學門為何被併入其它領域？」是否表現相較其它學門，尚不足以被認定可獨立成為學門？那麼傳播學術社群近年來在專題研究表現又如何？值得傳播學術社群成員的關注。

研究、教學、和公共服務等三個領域的表現，常用來作為衡量各個學術社群成員成就的尺度。其中研究這個項目所受到重視的程度，通常又超過教學和服務（Bowen & Schuster, 1986）。傳播學者藉由撰寫傳播書籍、投稿期刊論文、或研討會發表專文，作為參與學術社群的手段。

雖然專題研究過去則較少被國際學者視為學術表現的指標，但是由於歷史環境的因素，國家科學科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專題計畫，是國內傳播學者從事研究的指標之一。本研究分析國科會傳播專題補助記錄資料，藉以發現傳播學術社群近年來研究方面的生態變化。研究人員自電腦資料庫和紙面紀錄中萃取資料、進行分析，以解讀個人和機構從事專題研究的數量、經費資源的分配、以及內容主題的變化，期能進一步瞭解國內傳播學術社群參與研究的現況。

貳、從「產出力」到「參與度」

先前國外的若干研究曾用「研究產出力」的觀念，以解讀個人和機構參與專題研究的參與度。一般而言，學術社群的成員在其工作生涯中，有許多生產研究資訊的管道。舉凡出版學術專著、發表期刊論文、宣讀研討會論文、參與學術社團工作、或者是審查評鑑同儕稿件，都是表達學術成就的方式。研究產出力是「不發表即遭淘汰」（publish, or perish）的學術環境下的產物（Schweitzer, 1989）。過去從事學術產出力研究的學者們通常使用量化方法，計算學術機構或其成員在特定期間、就特定管道的發表頻率加以計算，而計算出學術機構和個人從事傳播研究數量上的排行榜（West, 1978; Vincent, 1984, 1991）。

由於專書、期刊論文、或研討會論文集提供比較具體的計量資料，也比較容易有系統地取得資料，因此這類的學術活動也較容易成為學者研究「產出力」的指標。例如 Cole 等人（1973）和 Schweitzer（1988）的產出力研究以美國傳播期刊論

文作為產出力指標；Dupagne（1993）以期刊和書籍二者作為指標；而 Adams 等人（1998）則以研討會論文的發表數量作為衡量傳播學門研究產出力的指標。這些國外的先前文獻並未將公私機構委託的專題研究納入評估指標。

先前傳播領域的學者探討研究產出力的範疇也各有不同。有些學者調查特定期間新聞傳播學者的研究產出力；例如 Cole & Bowers（1973）、King & Baran（1981）、以及 Schweitzer（1988）等人分別分析 1962 至 1971 年、1970 至 1979 年、以及 1980 至 1985 年間新聞傳播學者個人及其所屬機構的研究產出力。另外，有些學者則探討傳播學門下特定次領域學者的研究產出力，例如 Vincent（1989）和 Soley 等人（1983）學者分別關注電訊傳播和廣告領域學者的研究產出力。另一方面，作者性別與產出力的課題，也成為若干學者關注的焦點；例如 Hackson III 等人（1992）、Dupagne（1993; 1994）、以及 Adams 等人（1998）分別探討美國女性傳播研究人員在各種學術產出力的表現。

雖然傳統「產出力」的取向道出學術社群從事研究的部分現況，但是也有若干根本的問題未能解決。首先，「研究數量」是非常有限的指標。「多」和「好」這兩個概念本來就不盡相同。研究數量再多，未必研究品質比較好，也未必保證對學術社群貢獻較大。但是對於一個新興的學門而言，研究數量增加，可能代表學術社群開始具有發展的潛力。對於國內傳播學領域而言，這一重的意義可能比較重要。我們透過學者從事研究的數量，瞭解學術社群是否開始有規模地成長。

其次，過去研究產出力的文獻，傾向於計算學者出版的數量，也就是以學者在期刊發表文章的數量來論英雄。但是國內傳播研究腹地較小，具有同儕評鑑制度的期刊屈指可數。加上研究社群在這個方面才剛起步，符合樣本的資料較少，因此以「論文刊登數量」作為指標評估研究產出力，恐怕有困難。

最後，指標必須考慮學門環境。台灣傳播學界正在起步，用傳統「產出力」的概念來分析，有資料取樣的困難。另一方面，由於歷史環境因素使然，先前本地許多傳播研究，並未完成論文發表的型式，卻存在傳播學界思考問題方向和過程，這些線索不容忽視。

一言以蔽之，傳統產出力研究取向重視「結果」，對於研究的「過程」則較少關注。因此，必須另起爐灶。本研究認為，「參與」或許更接近我們的研究需求。

在台灣，學者「參與」研究的重要性，並不亞於「論文發表」。國內學者參與公私機構委託的專題研究，雖未必完成研究成果，但卻是在參與過程中，透過學術對話和經驗分享，而獲取知識。也就是說，學者透過「參與」組成研究社群。也必

須要有「參與」，才能踏出發表專著和論文的第一步。使用「參與」取代「產出力」的作為分析的概念，可能較容易掌握傳播學門發展的資料。

參、國科會專題研究

本研究所指的「國科會專題研究」，係指「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就傳播學門所提供經費補助的的專題研究計畫」。國科會對於「傳播學門」的定義，歷經數度改易。在 1984 年之前，傳播學門附屬於社會學門；1995 年傳播學門從社會學門中獨立出來，但至 2000 年傳播學門又被歸併回社會學門之中。⁽¹⁾

傳播研究，就像其它許多學術領域的研究，需要資源因應。雖然也有些學者自費進行研究工作，但是畢竟屬於少數。過去台灣地區許多傳播研究都曾經接受經費補助。祝基滢（1986：68）分析指出，這些資助傳播專題研究的資源，出於公共部門者眾，而來自於私人機構（例如新聞傳播媒體）者寡。國內的公共部門提供傳播研究補助的來源除了國科會，其它來源包括新聞局、文建會、研考會、以及若干地方政府。

國科會是傳播學者最重要的經費來源之一。從 1954 年至 1974 年之間的 136 件新聞傳播研究計畫中，有 56 件（41%）經費來源係國科會補助。汪琪與臧國仁（1996）在性質類似的研究中也發現，國科會專題研究補助比例，佔填答受訪者的 34.9%。汪琪等人（1996：25）便曾經指出，「雖然國科會只是眾多提供研究贊助的公私機構中的一個，但它也是所有機構中最積極支持學術（相對於應用）研究的單位。因此也承擔了傳播學界最殷切的盼望」，因此國科會專題研究即便未佔整傳播研究絕大多數，但其在學術上的影響力卻可能遠超過其所佔經費比例上的意義。

專題研究在國內傳播研究的發展歷程中是相當重要的指標。許多重要的研究是以專書或研究報告的形式發表（羅文輝，1995）。陳世敏（2000：12）則指出，「一般學術創作的出版過程，是先有學位論文和專題研究，再轉化為期刊論文，等到條件成熟再三醞釀，才有書籍的出現。」汪琪、臧國仁（1996：7）也認為「專題研究計畫通常是研究人員獲取一手資料的主要途徑。」也就是說，傳播研究人員通常必須要有資料，才能進一步到研討會發表論文、投稿期刊、或出版專書。國科會專題研究正是研究人員積累基本資料的手段。沒有專題研究的資料基礎，恐怕也就沒有論文專書的產出表現。如果從「過程」而非「結果」著眼，國科會專題似乎也是傳播研究產出過程中一個重要階段。⁽²⁾ 因此，國科會專題可以說是研究人員

「正在從事研究」的一項指標。

最後，國科會專題研究事實上也反映國內傳播研究社群發展的走向。目前國科會所有專題研究的經費補助，必須先由傳播研究人員向國科會提出計畫提案；然後由國科會交由各該學門的審稿人進行同儕審查（peer review），審查結果經過複審後核定補助。「爲了要作同儕審查，研究人員必須敘述研究概念、從事文獻分析、並說明研究方法，其它公民營機構在提供研究經費時，均有其政策或業務上考量，對於研究的要求……有別於一般學術標準」（汪琪、臧國仁，1996：7）。基本上，國科會補助研究的核定流程，必須經過同儕評鑑程序。儘管曾有作者批評同儕評鑑所衍生的種種問題，這些評鑑形成傳播專題研究補助的品管機制。⁽³⁾另一方面，審查也造成同儕之間的對話，使得這些研究案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國內傳播學術社群發展的走向。因此，不但被用來作爲若干學術行政的指標，也是用來檢視本地傳播學門發展足跡的一項指標。

國內傳播文獻，從早期的楊孝滌（1977）、楊世凡（1985）、祝基澄（1986）到近五年內汪琪等人（1996）的研究，均包含國科會專題研究。

楊孝滌（1977）和楊世凡（1985）的研究，係利用內容分析，瞭解當時台灣傳播研究的發展趨勢。前者以碩士論文和專題研究爲對象，後者資料分析範圍則涵蓋期刊論文、書籍、專題研究、以及政府出版品等。二者均將國科會專題研究列入分析對象。

祝基澄（1986）和汪琪等人（1996）的研究，則屬於新聞傳播學門規劃報告性質；主要目的也在評估傳播領域學門的整體發展趨勢，包括國科會專題研究在內的各種專題研究，都被當作瞭解學術整體發展的指標之一。例如汪琪和臧國仁（1993）依據國科會的專題計畫名冊及四十三位傳播科系專任教師所提供的資料，共分析了 212 項專題研究計畫，結果發現研究主題最多的類目依序爲大眾傳播（23.6%）、閱聽人分析（19.8%）、媒介實務（9.9%）、傳播與發展（9.0%）、以及政治傳播（7.5%）。

近年來有學者探討國內傳播典範變遷議題之時，也使用國科會專題研究作爲分析對象。這類的研究旨在探討國內傳播學者對理論和方法的認識、使用、以及研究典範的轉移，著重的是傳播學術「質」方面的變化。例如于心如與湯允一（2000）聚焦於 1989 至 1999 年期間的研究，作者們所分析的資料，除了各種傳播書籍、期刊、研討會、和博士論文以外，也引用國科會專題爲分析對象。此外，翁秀琪和景崇剛（2000）在一篇以本土傳播研究典範變遷爲研究題材的論文中，則以 1984 年

至 1999 年之間國科會專題研究提案作為分析樣本。翁秀琪等人發現，國科會專題研究在大眾傳播效果和過程方面的相關題材，比例急遽降低；而語言與傳播、批判理論、文化研究、和政治經濟學的比重則出現成長的趨勢。

上面引述的兩篇研究，都以國科會專題研究為研究對象，但是同樣也都在樣本蒐集方面，面臨了資料散亂不足的問題。于心如和湯允一的論文總共引用 61 篇專題研究，尚不足國科會當年核定總數 191 筆的三分之一。翁秀琪與景崇剛文章也指出，無法找到摘要或內文是整個研究過程中最嚴重的問題；以致於能夠名目的資料雖然有 252 筆，但是實際能夠用於分析的樣本卻不過 153 筆。資料殘缺不足，是一大問題。

本研究關心傳播學術社群近年來經過上述文獻的整理發現，過去國外學者較常以專書、期刊論文、或研討會論文衡量傳播學門的研究產出力，但鮮以專題研究為分析對象。而國內先前研究則不乏針對專題研究分析的例子。其實，如以「過程」著眼，國科會專題未嘗不能夠作為觀察國內傳播研究產製過程中的指標。

綜上所述，國科會專題補助研究是國內傳播學者的主要研究資源，也是學術界參與研究重要的線索。觀察和分析國內傳播學者對專題研究的參與程度，可以讓我們建構這個學門發展的資料。因此本文將借用國科會專題研究補助紀錄進行分析，期能透過參與機構、人員、內容主題等指標，瞭解國內傳播學術社群參與研究活動的生態。

肆、研究方法

資料庫分析。關於電腦資料庫已經逐漸成為許多領域學者獲取研究資料的重要源頭之一 (Alberice & Snow, 1985)。所謂「資料庫」是指一群文字、數據、或圖像的集合，可供人們輸入、儲存、查詢相關資料訊息的機制。隨著學術資料的快速增長，使用人力管理學術研究資料已經不再有效率。因此越來越多機構利用電腦資料庫被作為研究成果保存、查詢、和檢索的機制 (鄭瑞城等, 1999)。國科會是補助國內學者從事基礎研究的主要機構，自 1960 年代以來即建置電腦資料庫、保存該機構補助專題研究的相關記錄。本研究則從國科會電腦資料庫中、萃取傳播學門的核定紀錄，並將樣本資料轉換成為個人電腦格式，最後進行統計分析。

樣本。本研究以國科會人文處項下補助的傳播學門專題研究核定紀錄作為分析樣本。⁽⁴⁾ 國科會所提供的核定紀錄，保存了 1984 年至 2000 年之間的專案研究相關

資料。但是由於電腦發展階段⁽⁵⁾和學門範疇⁽⁶⁾時間階段而有不同資料型式。研究者必須逐一核對資料後進行登錄。國科會所提供的資料，每一筆都包含了主持人（共同主持人）、篇目名稱、執行年度、受委託機構、編號、經費額度、與主題類目。

國科會電腦所提供的樣本資料，但最早只能追溯到 1980 年，更早的資料便必須倚賴其它第二手資料來源。本研究所引用的第二手資料源自於祝基澄（1986：84-97）為國科會所執行的《新聞與大眾傳播學學門規劃報告》，該報告所列舉的資料總表最早的紀錄可以追溯到 1966 年，但是缺少經費額度的資料。從比例上來說，本研究源自電腦轉檔的樣本佔總樣本數 86.5%，而源自早期紙面資料的樣本則佔總樣本數 13.5%。紙面樣本因係二手資料，因此必須經過查證確認程序。研究人員首先查核政大圖書館的館藏資料、其次再電話訪問若干當年的計畫主持人，經過查證程序以後，再進行資料登錄。在登錄資料時，編碼員先將所有資料輸入試算表（Microsoft Excel），然後再轉換成爲統計軟體 SPSS 可以讀取的資料格式，最後進行統計分析。經過確認之後的有效樣本數爲 295 筆。時間涵蓋 1966 至 2000 年間，共計 35 年。

年度。「年度」指的是「專題研究計畫進行的會計年度」。在 1995 年以前，國科會對於研究計畫採隨到隨審的方式，從計畫核定和執行的時間可能有會計年度的落差；但是 1996 年以後，所有計畫皆在同一時間送審核定，因此樣本中所指的專題研究所指的年度比較一致，例如：1999 年度始於 1999 年七月，終於 2000 年六月。

參與機構。「參與機構」探討的是「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的研究人員所屬機構出現的次數」。過去研究不但調查學者個人的產出力，也調查學者所屬機構的整體生產力。本研究所指「參與機構」係將個人所屬單位的出現次數，加以累積計算。當一項研究計畫的研究人員分別屬於數個院校時，則以參與機構總數爲分母各計一次。例如分別來自三所學校的研究人員共同參與同一研究案時，則這三所學校的參與數各計三分之一。

參與人員。本研究所謂「參與人員」，指的是「向國科會提出研究計畫提案的主持人和共同主持人」。目前有的專題研究計畫由個人提出，當研究計畫由多數人共同參與時，通常會區分爲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和協同主持人，本研究所指的參與人員僅列入共同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的角色在專題研究中未必不重要，但因國科會檔案向來不保留協同主持人資料，因此本研究無系統化資料作爲計算依據，因此

不予計入。當幾個研究人員參與一項研究計畫時，則以人數為分母各計一次。例如三人共同參與同一研究案時，則每人各計三分之一。

與參與人員相關的概念為學術資歷、性別、以及合作類型。「學術資歷」探討的是「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以及講師通過專題研究計畫的次數」、「性別」探討的是「男性與女性研究人員專題研究計畫的次數」。「合作類型」指涉的是「個人主持或多人共同主持專題研究計畫的次數」

內容主題。本研究所蒐集的檔案資料，無論是國科會電腦檔案、紙面紀錄、或者是祝基滢的統計，都缺乏關鍵字和摘要資料可供判斷主題內容。因此研究人員必須針對各個標題進行篇目分析。篇目類型指的是「傳播學門專題研究主題分佈的頻率」。傳播學門研究涵蓋了相當多的次領域。主題分佈通常指涉的是這些傳播次領域的頻率變化。雖然國內外的文獻都曾從事傳播研究主題分佈的分析（例如祝基滢，1986；汪琪、臧國仁，1996；Adams & Bodle, 1998；許峻彬，2000），但是這些先前文獻對主題各有不同的認定類目。在國外，分析傳播研究內容主題的兩大主流分別是美國新聞與大眾傳播教師協會（AEJMC）與國際傳播學會（ICA）所使用的類目。在國內，從祝基滢（1986）、汪琪與臧國仁（1996）、翁秀琪等人（2000）都曾經發展出該研究所使用的類目。分析這些先前文獻可以發現，內容主題會因時空情境變遷而類目範疇有所增刪，這也使得研究者不易比較內容主題的變化趨勢。

國科會所提供的原始資料中，雖然註記有各個專題研究的類目，但是由於國科會學門歸類的範疇曾經幾度更易，註記類目指涉的內涵也隨之改變。⁽⁷⁾因此本研究決定不採用原始資料註記的內容主題。本研究分析主題所使用的類目表，係修改自鄭瑞城（1999）在《傳播資料庫（體系）建構之研究》、以及翁秀琪、景崇剛（2000）論文中所製作之類目表。研究者首先進行類目分析，先將類目表交由四位碩士級助理進行初步分析，以瞭解類目表是否能夠涵蓋所有研究篇目，⁽⁸⁾類目編碼結束後接著進行內容主題的資料轉換和統計分析。

經費額度。經費額度指的是「國科會核撥研究計畫提案的研究經費數量」。經費額度所指涉的國科會提供研究人員的資源數量。經費既是重要的研究資源，我們關心經費比例是否逐年增加或減少？這就涉及各年度補助機構經費比較的問題。本研究經費相關資料涵蓋 1981 到 2000 年之間的二十年，所有經費額度都先列出當年幣值，再換算通貨膨脹後的額度。本研究所使用的通貨膨脹率基準，係以 1996 年幣值為準。例如，2000 年的幣值與 1996 年相較，通膨率為 102.11。因此，研究人

員將 2000 年的經費額度除以通膨率，而得到實際的經費值額度。

伍、研究發現

一、樣本資料的綜合描述

本研究所取的樣本是國科會核定申請的專題研究計畫。本研究共採得樣本 295 件。若以每五年為一單位檢視，則發現樣本分佈的狀態相當不均。前面廿五年（1966-1990）的樣本僅佔總數四分之一，這段期間樣本年均數從 1.8 一直到 3.2 件不等。但是 1990 年以後時間樣本數佔總數的四分之三。在 1991-1995 年間，樣本年均數達到九件。在 1996-2000 年度，專題研究核定件數分別是 24 件、31 件、41 件、42 件、以及 48 件；則年均件數更達到 37 件之多。最後五年期間的核定數，幾乎佔了 35 年來核定案件總數的三分之二。因此可以說，國科會的專題研究近年來歷經高速成長。

表一：國科會專題研究數量和類型（1966 至 2000 年度）

年 度	樣本數	年均件數	百分比	經費額度（萬元）	平均額度（萬元）
1966-1970	11	2.2	3.7%	--	--
1971-1975	16	3.2	5.4%	--	--
1976-1980	13	2.6	4.4%	--	--
1981-1985	9	1.8	3.1%	88	44.2
1986-1990	16	3.2	5.4%	871	58.1
1991-1995	45	9.0	15.3%	1,893	42.1
1996-2000	185	37.0	62.7%	7,830	42.3
總 計	295	--	--	10,684	43.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國科會人文處提供之資料

表二列舉近五年來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核定通過比例。表列數字顯示，近五年來傳播學者總共向國科會遞出了 311 件計畫提案（平均每年為 62.2 件），而核定通過的研究案為 185 件（平均每年為 36.6 件）。平均通過比例為 59.5%。專題研究核定比率有逐漸下降的趨勢。表二統計顯示 1996 年度核定比例為 63.2%，2000 年度降到 55.6%；五年之間總共降了 7.6%，平均每年減少 1.67%。

表二：1996 至 2000 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核定通過比例

年 度	傳播學門 申請件數	傳播學門 核定件數	傳播學門 核定比率	社會學門 核定比率	人 文 處 總核定比率
1996	38	24	63.2%	58.0	64.9
1997	51	31	60.8%	68.2	66.9
1998	69	41	59.4%	61.4	57.7
1999	72	42	58.3%	58.8	56.6
2000	81	45	55.6%	63.5	53.2
平均值	62.2	36.6	59.5%	62.0	59.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國科會人文處提供之資料

傳播學領域專題研究的核定比例和其它領域相比如何？整體而言，傳播學領域的核定件數比例（59.5%）低於社會學門（62%），而與人文與社會科學整體的核定比例（59.9%）大約相當。比較表二 1996 至 2000 年度傳播、社會、與整體人文專題研究核定率數字可以發現，雖然三者都有降低的趨勢，但是步調相當不同。社會和人文部門全體的計畫核定率，呈現幾度起伏的現象，而傳播學門年均降幅則一路穩定下降。前面提及，傳播學領域在 1996 年以來核定的件數大增，是否因此申請案件會較浮濫？但從上面三項核定率的比較可知，其實傳播學門近五年申請件數激增，但是年均通過率並沒有特別高過其它學門，而維持在一般人文學科的平均水準。因此傳播專題研究數量的高度成長，應該是申請件數增加的結果，而非核定條件放寬所致。

二、學者和學術機構的參與

為何最近十年國科會核定的傳播專題研究會呈現大幅度成長？這段期間傳播科系增設數量快速增長、改變傳播研究的人力結構。國內傳播研究向以大學院校的專任教師為核心。誠如汪琪和臧國仁（1996）指出，儘管「近年來，隨著傳播事業快速成長，也逐漸有越來越多的專業人才進入媒介、廣告界、或政府機構工作。但是由於學校以外的的工作缺乏有利條件進行研究，因此傳播研究的主力仍然是傳播相關科系專任教師。」

教育部歷年統計資料則顯示，解嚴以後國內大學院校中傳播科系數目大幅擴張，專任教師人數亦隨之迅速增加。從 1988 年到 2000 年之間，研究所的數目從四

所成長為十九所；另一方面，四年制大學的新聞傳播科系也從 9 個暴增為 58 個。也就是說，在短短十二年內，國內傳播相關研究所和大學部的數量分別膨脹為 1988 年的 4.75 倍和 4.46 倍。無論是甫成立的新系所、或是由原有專科改制升級的四年制大學系組，都必須引進相當數量的教學研究人力。因此在 1988 年之時，國內傳播學門相關院、所、系、組講師層級以上的專任教師僅有 58 人，但是到了 2000 年之時，則教師數目已經增長至 330 人，約為 1988 年的 5.7 倍。

表三：國內傳播系所與教師數量的變化（1988 至 2000 年度）

年度	研究所	大學部	系所數	教師數
1988	4	13	17	58
1991	4	15	19	101
1994	6	22	28	205
1997	11	34	45	287
2000	19	58	77	330

資料來源：教育部（2000）

羅文輝（1995）指出，在 1980 年代初期，傳播相關系所教師中擁有博士學位的不到十人，到 1995 年則增為七十人。在 2000 年時，「傳播相關領域的博士，已經超過一百五十位以上，且半數以上是近五年甫獲學位，投入教學研究的師資；傳播學門發展過程中一直面臨之研究人力不足的窘境，於焉改觀」（趙雅麗、鍾蔚文，2000）。

雖然學門人口結構的改變，改善了這個領域學術發展所需要的人力條件，也帶動了傳播研究的風氣。但是在個別學者和機構參與國科會專題研究的數量方面，傾斜現象仍屬無可避免。根據教育部的統計，1996 至 2000 年之間，傳播科系講師層級以上專任教師的年均數為 297 人；但是在同一時期，至少曾經參與過一次專題研究的學者（無論獨自主持、或與他人共同主持）數目則僅有 95 人，僅佔年均教師數 32%。換句話說，有將近三分之二的傳播系所專任教師沒有參與國科會研究。

本研究資料也顯示，最近五年個人共計參與研究計畫最多為五次（一人）。其餘依序為：四次以上者 10 人（3.4%），三次以上者 12 人（4.1%），兩次以上者 30 人（10.3%），一次以上者 33 人（11.3%）；此外，與他人共同參與研究計畫未達一次者 9 人（3.1%）。從這項數據可知，在參與過國科會專題研究的 96 位學者

當中，有三分之二在最近五年中參與一至二件計畫；每年至少申請一項專題研究者，在整個傳播學界中僅有一人。

在機構的參與數量方面，也呈現一定程度的傾斜現象。在 1976 年以前，政治大學是唯一擁有國科會專題計畫的學校；此後隨著各校加入，執行機構也逐漸分散，但是專題研究集中於少數學校的現象仍然存在。從整體資料來看，35 年中至少曾經執行過一次專題研究計畫的學校只有 17 所。⁽⁸⁾ 在數量上也可說是相當集中。

表四：專題計畫參與研究機構前十名的比較

總數排序	學校	件數	比例(%)	教師人數*	人均比**
1	政大	67.7	36.9	40.1	1.68
2	世新	25.5	13.9	47.0	0.30
3	輔大	14.7	8.0	22.4	0.63
4	中正	11.0	6.0	5.0	2.22
4	淡江	11.0	6.0	10.0	1.10
6	文大	8.0	4.4	26.2	0.31
7	台大	7.0	3.8	4.0	1.75
7	交大	7.0	3.8	4.0	1.50
7	元智	7.0	3.8	7.6	0.92
10	中山	6.0	3.3	4.0	1.50
11	師大	5.0	3.0	2.7	1.88

* 教師人數依 1996-2000 各校教師人數之平均值。

** 人均比係各校提案數除以教師年平均後所得之商數。

表四列舉參與國科會專題研究次數最多的前十所學校。如以學校設立傳播系所的時間區分，則可發現其中新舊機構各佔一半。在這些較常參與國科會研究的機構中，又以歷史最悠久的政治大學為最大宗。在卅五年中囊括將近一半的研究（47.8%），但是近五年來，研究案集中於政大的趨勢已經緩降至 36.9%。

本研究也發現，公立大學教師以及新近成立的研究所教師提案比例，明顯超過成立較久的傳播科系。如果我們觀察提案人均比（也就是把各校承接計畫的數量除以教師人數），則發現公立大學傳播系所高於私立學校，而新近成立的系所表現普遍優於成立較久的系所。如表四所示，提案比例高的系所大多為 1990 年以後成立

的系所。例如中正（2.22 件）、師大（1.88 件）、台大（1.75 件）、和中山大學（1.5 件）。這些國立大學的傳播研究所雖然設立不久，但是提案人均比超過多數 1990 年以前成立的傳播系所，隱然有後來居上的傾向。教學負擔的差異可能是使得新系所教師比舊系所教師專注於研究的一個重要的因素。

此外，有兩三所學校（如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朝陽大學、和台灣藝術學院），這些學校連續數年均有一項研究計畫上榜。進一步觀察，則係同一學者持續參與的專題研究。

在「學術資歷」這個項目，探討的是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和講師擔任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的頻率。結果發現，在 1966 至 2000 年之間教授參與專題研究的次數為 71.4 件，為同時期總數的 24.2%；副教授為 208.4 件（70.7%）；助理教授 12.5 件（4.2%）；講師 2.49 件（0.8%）。如果只看最近五年（1996 至 2000 年）的件數，則教授參與的次數為 26.9 件（14.6%）；副教授 144.02 件（77.8%）；助理教授 12.17 件（6.6%）；講師 2.16 件（1.2%）。然而單有產出值數字比例還不足以觀察，應該對照各個層級的年均人數比例。根據教育部歷年來的統計資料，在同一時期，大眾傳播學門教授年均人數為 41 人，佔同時期教師總數的 13.8%；副教授 118 人（39.7%）；助理教授 22 人（7.5%）；講師 125 人（42%）。比較人數和產出值可以發現，教授和助理教授的人數和產出值比例約略相當。教授人數佔 13.8%，產出量為 14.6%；而助理教授的人數比例佔 7.5%，產出量則為 4.2%。

另一方面，副教授和講師在人數比例雖然都接近四成，但是產出量比例，卻有懸殊差異。副教授人數將近四成（39.7%），但參與的研究案佔 77.8%，而講師的人數雖然多於四成（42.0%），但參與專題研究的比例，卻只有百分之一出頭（1.16%）。從這些資料可以發現：副教授層級是國科會專題研究的主力；但講師對專題研究的參與，則極其有限。副教授參與專題研究比例高，或許可以解釋為副教授有累積著作升等的趨力，因此較勤於作研究。但是從現實上考量，講師這個層級應該也同樣適用於著作升等的規定或要求；如果講師不作研究，如何累積成果升等？國科會規定，講師必須服務滿四年以上始得申請專題研究，這固然可能是講師參與比例較低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更進一步思考，除了年資門檻，講師參與專題研究的數量為何偏低？參與專題研究的障礙在哪裡？這些問題或許也值得探討。

接下來觀察的是參與人員的性別分佈比例。從樣本分析所顯示的數字看來，男性研究者共參與 142 件專題研究（佔總數 48.1%），女性研究者參與 134 件研究

(45.5%)，而兩性合共同參與的研究有 19 件 (6.3%)。初步觀察，男女研究者產出數量約略相當。但是如果加入時間因素，則發現二者之間的消長趨勢。

表五：學術資歷和參與研究計畫的件數 (1966 至 2000 年度)

年 度	男性	%	女性	%	合作	%	總和
1966-1970	11	100.0	0	0	0	0	11
1971-1975	16	100.0	0	0	0	0	16
1976-1980	13	100.0	0	0	0	0	13
1981-1985	6	75.0	2	25	1	11.1	9
1986-1990	12	75.0	2	12.5	2	12.5	16
1991-1995	19	46.3	22	53.6	4	9.8	45
1996-2000	57	30.8	116	62.7	12	6.5	185
總 計	142	48.1	134	45.5	19	6.3	295

在 1980 年以前，國內傳播學領域還沒有女性學者，參與專題研究也以男性學者為主；1980 年代以後女性學者開始加入這個行列。以後女性學者參與研究的比例逐年增加。最近五年 (1996-2000 年) 的資料顯示，男性學者參與的研究件數為 57 件 (30.8%)；女性學者參與的研究件數為 116 件 (62.7%)；二者共同參與者 12 件 (6.5%)。對照教育部的人力統計資料，在同一時期，講師層級以上教師人數的男女比例，約為 53：47。男性教師人數比例為 53%，但是僅參與三成左右 (30.8%) 的研究；而女性為 47%，但參與研究的件數比例卻達到六成以上 (62.7%)。

從以上兩組數字的比較可以約略看出，近五年來傳播學門的女性學者參與國科會專題研究的程度似乎超過了男性學者。過去若干女性研究顯示，職業女性通常比男性面臨更多的職場與家庭的雙重壓力；傳播學門的女性學者在教學、研究、和公共服務之餘必須操持家務者，並不在少數。在這種情況下，女性學者還能呈現較高的參與專題研究比例，箇中原因值得進一步探究。

此外，研究數量日漸增長，傳播學術社區的規模似乎也隱然成形。既是社群，就應該有互動和交流。同儕審查、或研究成果論文的宣讀與評論，固然是學術社群成員對話的機會，但是最有效而密集的互動，應該發生在研究過程中的討論與分享。一般說來，合作型的研究計畫比個人執行計畫更能形成配置性的認知環境、產生討論與知識經驗分享的效果。尤其，國內傳播學術社區成員多數才剛剛展開教學

研究工作，知識交流與資訊分享理當特別重要。國科會專題研究是否提供傳播學術社群一個對話機制？值得關注。

歷年來個人型與合作型計畫的比例。表一資料顯示，個人型計畫的比例平均約占八成（79.66%），而合作型計畫的比例則僅占兩成（20.34%）。也就是說，每五件計畫只有一件是合作的研究案。國內傳播學者習於單打獨鬥的傾向似乎一直未見改變。雖然國科會近年來積極鼓勵學者進行合作型計畫，但是合作型的研究並未見增長；個人研究比例始終偏高。上述資料顯示，「學術社區成員從專題研究過程、進行知識交流與分享」在目前還只是理想，專題研究對這項機制能夠提供的助力，似乎相當有限。

三、內容主題的變遷

在內容主題方面，本研究對 1966 至 2000 年度國科會傳播學門的專題研究進行篇目分析，並將隸屬於各個類目的專題研究件數加以累計，結果如下所述：

在過去卅五年間，專題研究類目累計比例最高的五類內容主題依序為：新聞學與新聞媒體（14.4%）、大眾媒介效果與傳播過程（14.2%）、新傳播科技（9.8%）、傳播政策與法規（8.3%）、以及廣告、公關、行銷與消費行為（8.1%）。而比例最低的五類內容主題則依序為：傳播與媒體道德（0%）、傳播與性別（1.0%）、國際傳播（1.4%）、傳播教育（1.9%）、健康傳播（2.2%）。

爲了瞭解研究內容主題的趨勢走向，本研究比較近五年（1996-2000 年）和過去卅年（1966-1995 年）專題研究類目出現頻率的百分比。結果發現，專題研究比例增加幅度最大的三類研究，依序為「廣告、公關、行銷與消費行為」、「新傳播科技」、以及「傳播與語言」。其中，「廣告、公關、行銷與消費行為」研究出現的比例從 3.2% 增長至 11.1%，增幅為 7.9%，比例增加為三個類目之冠。「新傳播科技」研究出現的比例則從 5.5% 增長至 12.4%，增幅為 6.9% 居次。「傳播與語言」研究出現的比例也從 1.4% 增長至 7.0%，增幅為 5.6%。

另一方面，研究比例降幅最大的三個類目分別是「大眾媒介效果與傳播過程」、「新聞學與新聞媒體」、和「傳播史」。其中，大眾媒介效果與傳播過程研究出現的比例從 26.4% 滑落至 7.0%，降幅高達 19.4%。新聞學與新聞媒體研究次之，比例從 17.7% 降至 12.4%，降幅為 5.3%。而傳播史研究出現比例，則從 17.7% 降至 12.4%，降幅 4.7%。

此外，「傳播政策與法規」、「政治傳播」、和「廣播電視和電影」這幾個研

究類目的出現次數，雖然有小幅的升降變動，但是比例分別都略高於百分之五以上。例如「傳播政策與法規」研究從 9.5% 微降至 7.6%、「政治傳播」研究從 6.8% 降至 5.9%、而「廣播電視和電影」研究則從 5.0% 略升至 5.7%。以上這些數字似乎顯示，傳播學者們對這些類型的題材始終保持著一定的興趣。

表六：1996 年國科會專題研究內容主題的變化

不同時期的比較 內容主題類目	類目出現次數與百分比				變動 百分比	1996-2000 年間 總計	
	1966-1995 年間		1996-2000 年間			件數	百分比
	件數	百分比	件數	百分比			
大眾傳播效果與過程	29.0	26.4	13	7.0	-19.4	42.0	14.2
傳播理論與方法	2.0	1.8	5.5	3.0	1.2	7.5	2.5
新傳播科技	6.0	5.5	23	12.4	6.9	29.0	9.8
傳播政策與法規	10.5	9.5	14	7.6	-1.9	24.5	8.3
傳播史	6.0	5.5	1.5	0.8	-4.7	7.5	2.5
新聞學與新聞媒體	19.5	17.7	23.0	12.4	-5.3	42.5	14.4
廣播、電視與電影	5.5	5.0	10.5	5.7	0.7	16.0	5.4
廣告、公關、行銷與 消費行為	3.5	3.2	20.5	11.1	7.9	24.0	8.1
傳播與語言	1.5	1.4	13.0	7.0	5.6	14.5	4.9
傳播與性別	0.0	0.0	3.0	1.6	1.6	3.0	1.0
傳播與媒體道德	0.0	0.0	0.0	0.0	0.0	0.0	0.0
文化研究	4.0	3.6	11.5	6.2	2.6	15.5	5.3
批判理論與 傳播政治經濟學	2.5	2.3	5.5	3.0	0.7	8.0	2.7
媒介管理與媒體經濟	1.0	.9	8.5	4.6	3.7	9.5	3.2
傳播教育	1.5	1.4	4.0	2.2	0.8	5.5	1.9
人際傳播	4.0	3.6	3.5	1.9	-1.7	7.5	2.5
國際傳播	1.0	.9	3.0	1.6	0.7	4.0	1.4
健康傳播	3.0	2.7	3.5	1.9	-0.8	6.5	2.2
政治傳播	7.5	6.8	11.0	5.9	-0.7	18.5	6.3
組織傳播	2.0	1.8	7.5	4.1	2.3	9.5	3.2
總計	110.0	100.0	185.0	100.0	N/A	295.0	100.0

最後，在最近五年躍升至百分之五以上的研究，除了前面已經提過的「廣告、公關、行銷與消費行為」、以及「傳播與語言」等兩類之外，「傳播與文化」研究的比例也從 3.6% 升至 6.2%。

總之，以類目出現次數作為指標，可以看出國科會專題研究內容主題的消長趨勢。汪琪和臧國仁（1993）先前對專題研究所做的類目分析顯示，大眾傳播和新聞學這兩個領域一直是傳播學門最重要的內容主題。但是翁秀琪等（2000）的研究則發現以大眾傳播為主題的研究比例有大幅下降之勢。在傳統研究取向比例縮水的同時，若干研究領域的比例則持續攀升。本研究結果顯示，近年來受到學者注意的研究領域，似乎比較偏重在政府機構以及產業相關的應用研究。例如「廣告、公關、行銷與消費行為」、「傳播政策與法規」、「新傳播科技」、「媒介管理與媒體經濟」、以及「組織傳播」等。

四、資源的分配

國科會的專題研究成為許多傳播學者從事研究的重要資源。這是因為國科會委託研究，比較傾向鼓勵理論研究。經費來源和申請核定時程與其它提供委託機構比較，可能較為穩定。但是所有官方資源都有分配的問題。國科會的經費資源如何分配？与其它學門之間的差異又如何？這個部分探討經費分配的現狀。不過，由於部分早期專題研究的經費額度係來自二手資料，當初並未臚列經費額度。因此最初廿年間（1966 至 1985 年）樣本經費額度資料已失佚而不可得。本研究資料主要來自國科會提供。

國科會提供的資料顯示，十五年來投注在傳播學專題研究的經費額為一億六百八十三萬台幣。單一年度經費也從 1980 年代初期的 88 萬元一路成長到世紀末的 7,830 萬元。雖然在特定的年度預算小幅度下降（例如 1999 年因受 921 地震而微幅減少），但整體經費和核定件數同樣呈現高度成長。

所謂「平均核定額度」，是指各個年度經過核定的經費總額度，除以同年度核定件數之後所獲得的數值，例如在 2000 年度傳播學門的平均核定額度為 47.5 萬元。平均核定額度除了顯示同年度經費水準，還可以用來觀察比較個別年度研究案的金額數目。本研究比較 1981 年以來的經費資料之後發現，各年經費度平均額度除了 1980 年代末（58.1 萬元）特別突出之外，其餘時期經費額度都穩定地維持在 42 至 44 萬元之間的水準。

傳播學者計畫送審和核定金額之間存相當大的的差異。以近五年為例，傳播學

領域平均每年送審的申請金額為台幣 2,707 萬元，但實際核定通過的平均金額為 1,112 萬元，平均核定的額度比例為 45.3 %。換句話說，所有送審計畫未通過加上研究計畫被刪減的金額比例高達 54.7%。然而，這個現象並非獨立個案，而是整個人文與社會學科部門的共同現象。表七比較傳播學門、社會學門、和整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核定經費的比例。數字顯示，傳播學門專題研究經費核定比例（45.3%），雖稍低於社會學門（52.4%）；但是卻遠高於人文與社會科學整體平均額度（39.3%）。雖然平均額度稍有出入，經費核定比例緩降的趨勢都大致相同。這可能也意味著未來傳播學者參與的人數日漸增加，審核和核撥經費的比例可能將更嚴格；爭取研究經費將更不容易。

表七：近五年相關領域的專題研究經費核定比例（單位：%）

年度	傳播學門	社會學門	人文整體
1996	50.1	63.6	36.4
1997	46.3	53.4	44.4
1998	41.6	53.0	40.0
1999	40.6	57.0	37.9
2000	47.8	52.4	38.1
平均值	45.3	52.4	39.3

資料來源：國科會人文處（2000）

陸、摘要與建議

雖然先前文獻（如汪琪、臧國仁，1996；趙雅麗、鍾蔚文，2000）都曾經指出，學者參與傳播研究的比例偏低。本研究結果發現，近五年（1996-2000 年）國科會傳播專題研究提案的量質均有所提昇。

在 295 筆有效樣本當中，前面卅年（1966-1995 年度）樣本僅佔總數三分之一；而最後五年期間（1996-2000 年度）則佔了總數三分之二。因此可以說，近五年來國科會的專題研究歷經高速成長。在這五年之間，傳播學者平均每年向國科會遞出 62 件計畫提案，而平均每年 37 件核定通過，核定通過率約六成。同一資料也顯示，近五年本領域的通過核定率正以每年減少 1.6% 的步調，逐年穩定下降。

進一步比較相近的社會學門和人文社會科學整體部門的資料，發現本領域年均

通過率，相當接近人文與社會科學所有學門的平均水準。因此傳播專題研究數量高度成長，應非條件放寬所致。

專題研究數量比例，向公立大學和研究所傾斜的現象仍然存在。卅五年中的 295 件研究案來自於十七所大學。在參與國科會專題研究次數最多的前十所學校中，新舊機構各佔一半。政大、世新、輔大、淡江、和文化大學等學校的傳播系所都在 1990 年以前成立。成立時間較長的系所雖然在絕對數量上佔優勢，但是中正、台大、交大、師大和中山等新設研究所，在平均比例方面已經大幅超過較老的系所。

個人機構參與專題研究方面也有傾斜的現象。以近五年為例，傳播科系專任教師至少曾經參與過一次專題研究的學者則僅有 95 人，僅佔年均教師數 32%。另外可能有三分之一從未參與國科會專題研究。

從參與者的學術資歷和性別來看，副教授構成專題研究的主力。副教授人數佔專任教師不到四成，卻參與了將近八成的專題研究。講師人數略多於副教授，但是參與比例明顯偏低。另一方面，女性教師參與專題研究的表現可圈可點。女性學者在 1980 年代以後開始加入專題研究的行列。近五年來，人數不到傳播專任教師一半的女性，參與的研究件數比例卻將近三分之二；表現超過男性教師。以上的數字顯示，參與國科會參與專題研究的人口，集中在任教於公立大學和研究所、副教授以上的女性教師。

雖然研究數量日增，傳播學術社群也在近年隱然成形；但是傳播學者合作從事研究的氣候尚未普及。大多數研究計畫都是一年期、個人型的研究。卅五年來研究計畫以個人型居多，合作型計畫的比例則僅占兩成。換句話說，共同主持、跨年、跨校的計畫比例非常之低，這種傾向並不利於學門長期知識的積累。國科會雖然推動整合型計畫，鼓勵學者共同參與；但是資料顯示，傳播學者的改變相當有限；單打獨鬥的個人型研究仍是主流。

在內容主題方面，傳播學者給最多關愛眼神的類目依序是：新聞學與新聞媒體、大眾媒介效果與傳播過程、新傳播科技、傳播政策與法規、以及廣告、公關、行銷與消費行爲。而遭到冷落的主題類目為：傳播與媒體道德、傳播與性別、國際傳播、傳播教育、健康傳播。

比較近五年和過往研究類目的差異，可以發現若干內容主題消長的趨勢。「大眾媒介效果與傳播過程」、「新聞學與新聞媒體」、和「傳播史」這三類研究的比重，都大幅跌落。「廣告、公關、行銷與消費行爲」、「新傳播科技」、以及「傳

播與語言」這三類研究的比重則增加較多。至於「傳播政策與法規」、「政治傳播」、和「廣播電視和電影」方面的研究則一直維持相當的比重，似乎顯示國內傳播學者們對這類題材始終保持興趣。

在經費資源方面，國科會在傳播專題研究的單件經費額度都穩定地維持在 42 至 44 萬元之間的水準。近五年以來，傳播專題研究經費的核定比例，低於社會學門，但高於人文社會科學的整體平均水準；經費核定比例呈現緩降的趨勢。這可能也意味著傳播學者參與的人數日漸增加，而經費資源大餅逐漸縮小；未來爭取研究經費的競爭，勢將更為激烈。

國科會人文處在 1996 年之時，將傳播學門的專題研究審核作業從社會學門中抽出獨立。這個改變對於傳播社群成員而言，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也就是說，傳播學領域至此被認可為一個獨立的學門。因此在五年之後，當國科會再度將傳播學重新歸屬到社會學門下之時，領域中人聞之不免感受到挫敗的經驗。在各種聚會場合，也聽到各種猜測和檢討。

但從本研究所蒐集的資料來看，在這五年之間，傳播學者參與專題研究的數量，呈現高度成長；不但參與提案的學者和學術組織來自於各方，內容主題也從新聞學和大眾傳播理論擴散到各種新的研究議題。這些證據很難讓人認為傳播學界參與國科會提案的「能量不足」。其實，傳播學者大可不必在意外界的看法，傳播研究社群如何提升本身的學術實力倒比較值得重視。

另一方面，本研究的發現也透露了若干警訊，值得傳播學術社群注意。首先，國內傳播科系專任教師在參與研究一事上，歧異甚大。從事研究工作的成員僅佔整個學術社群的三分之一，對於本領域的長久發展，不是好事。如何鼓勵研究的風氣，降低傳播教師之間的「參與落差」、使得參與補助的教師更趨於多元，應是當務之急。

其次，專題計畫中行政和產業導向研究充斥的現象，也值得識者憂心。⁽¹⁰⁾ 蘇鑰機（1993）甚至嘲諷此間傳播研究為「行政研究」，八十年代以來，雖有若干理論研究（如文化研究、政治經濟學）正面迎戰先前的研究取向，但是畢竟數量仍然有限。進入 1990 年代，專題研究主題如「廣告、公關、行銷與消費行為」、「傳播新科技」、以及「媒介管理與媒體經濟」等研究的崛起，又與解嚴後媒體商業化的趨勢有關。顯示即便是國科會所支持的傳播專題研究，也仍然難逃行政和產業導向的金箍咒。

最後，對於已經開始從事研究的教師們而言，研究方式如何從「單打獨鬥」走

向「協同合作」，是相當重要的！長久以來，傳播學者習於個人式的研究計畫，但是隨著申請案日漸增加、經費資源大餅有限，未來傳播社群成員必須學習在有限資源下追求研究成果，因此必須考慮協力研究的可能性。

更進一步說，傳播學界也必須透過團隊合作，才能夠進一步爭取學術的認同、建立國際知名度。1999 年底國科會「學術追求卓越計畫」審查結果公佈，入選計畫反映了各該領域的研究方向。陳世敏（2000a）感慨地指出，「學術的事，就是團隊長期經營的事，不能取巧，沒有例外。這是計畫評審之外的弦外之音，對台灣學術界應有相當的啟發作用。」傳播研究如果要累積研究知識和經驗。建立研究團隊透過多年的、跨校的、以及跨領域的知識整合，較能竟其功。展望未來，傳播社群成員應該思考共組團隊、參與整合型的專題研究，並透過知識交流討論和分享的機制，以共同累積研究的成果。

註釋

- (1) 目前國科會人文與社會科學處之下的「社會學門」包括數個次領域；除傳播學以外，尚有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公共衛生學、護理學、文化研究、性別研究等學門。
- (2) 從過去經驗來看，補助研究事後並不保證受到補助的研究人員一定依照提案完成專題計畫，同時專題計畫完成也未必保證研究人員會進一步將研究成果加工出版專書、發表期刊論文、或投交學術研討會。
- (3) 目前已有相當數量的校系同意其專任教師執行國科會計畫抵免教學時數。此外，若干傳播科系也以國科會計畫作為評估人員任用升等的依據之一。
- (4) 申請國科會研究補助的傳播學者未必會把計畫提交到人文處或傳播學門（也就是作業代號為 HK 的領域）。例如有些傳播研究係透過科學教育處獲得補助、有些則透過其它人文學門的次領域，例如圖書資訊學，或社會學門的次領域，例如文化研究、或性別研究學門。這些未經過傳播學門審查、但或許與傳播相關的專題研究，都不在本研究分析之列。
- (5) 1992 年之後產出的資料可以轉換成為個人電腦檔案。之前在 1984 至 1991 年期間的資料，則由大型電腦主機以九軌磁帶儲存，儲存格式迥異。由於受到轉檔技術的限制，僅列印出紙面資料。
- (6) 學門範疇是另一個問題。在 1984 到 1992 年之間，傳播學尚無獨立之學門代

碼，因此研究者必須以人工判讀，將屬於傳播專題研究從一般社會學門的研究中抽離出來。

- (7) 在 1970 年代及 1980 年代初期，傳播研究計畫大都被歸類為社會學門中的「資訊傳播」類目。在 1980 年代後期，傳播研究計畫被歸入「傳播學」、「文化研究」等類目。直到 1980 年代初期，類似於 ICA 或 AEJMC 所用的較詳細類目，才被國科會採用。
- (8) 當類目表確立後，所有樣本 295 筆交給兩位登錄員進行編碼。擔任編碼工作的兩位編碼員，一位是博士後的研究人員，另一位是碩士研究生。為瞭解編碼員對類目的同意程度，本研究採用 Holsti (1969) 所發展的編碼員間信度檢測公式，隨機抽取 20 筆資料進行檢測，結果編碼員間信度係數值為 0.77。
- (9) 統計初步結果顯示共有廿四所機構曾經申請過傳播學門的專題研究計畫，扣除非學校單位（例如中研院、台省家庭計畫研究所）之後，得廿一所，再扣除陽明、清華、和中興等未設有傳播科系的大學之後，僅存 17 所。
- (10) 誠如程宗明 (1998) 指出，1949-1980 年台灣傳播媒介體制、教育體系、和研究典範的形成，都和當時的美援與心戰策略密切相關，早期研究中的大眾媒體過程與效果、政治傳播、以及新傳播科技研究，政經結構因素支配的痕跡，隱然可見。

參考書目

- 于心如、湯允一 (2000)。《台灣傳播研究典範之分析：以 1989-1999 為例》，2000 中華傳播學術研討會，台北深坑：世新會館。
- 王石番 (1996)。《傳播教育課程規畫研究》成果報告，台北市：教育部專題研究，未出版。
- 汪琪、臧國仁 (1996)。〈成長與發展中的傳播研究：1995 學門人力資源調查報告〉，《新聞學研究》，53: 61-84。
- 何醇麗、林寶玉 (1999)。〈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八十九年度專題研究審查概況〉，《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2(3): 14-19。
- 程宗明 (1998)。《析論傳播學研究／實務的生產 (1949-1980) 與未來：從政治經濟學取向思考對比典範的取向》，1998 年中華傳播學術研討會，台北深坑：世新會館。

- 祝基澄（1986）。《新聞與大眾傳播學：學門規劃資料》，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編號：H170402），台北：國科會。
- 須文蔚、陳世敏（1996）。〈傳播學發展現況〉，《新聞學研究》，53: 9-53。
- 許峻彬（2000）。《從書籍出版分析台灣傳播學的發展（1947-1999）》，台北：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翁秀琪、景崇剛（2000）。《傳播領域認識論典範之變遷：以 1984-1999 年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為例》，哲學與科學方法——第四屆人文社會科哲學基礎研討會，台北文山：國立政治大學。
- 陳世敏（2000a）。〈教育部「學術追求卓越」下文〉，《傳播研究簡訊》，21: 19-21。
- 陳世敏（2000b）。《台灣傳播學術書籍的出版》，2000 年中華傳播學術研討會，台北：深坑。
- 楊世凡（1985）。《台灣傳播學術研究之表析：民國五十三年至七十四年》，台北：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臧國仁、汪琪（1993）。《台灣地區傳播研究的回顧與展望》，1993 年中文傳播暨教學研討會，桃園：中正國際機場過境旅館。
- 鄭瑞城等（1999）。《建構傳播資料庫之研究（第一期）》，行政院國科會專題研究成果報告，未出版，計畫編號：NSC 87-2418-H-004-013。
- 鍾蔚文、趙雅麗（2000）。《台灣傳播學學術期刊與傳播學研究環境》，2000 年中華傳播學術研討會，台北深坑：世新會館。
- 羅文輝（1995）。〈台灣傳播研究的回顧：1951-1995〉，收錄於朱宏源編《分析社會的方法》，屏東：「分析社會的方法」研討會，空中大學、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國立屏東師範學院主辦。
- 蘇侃（2000）〈國科會審查方式，宜修正〉，《中國時報》，第 15 版時論廣場，2000 年 8 月 27 日。
- 蘇鑰機（1993）。〈學術邊陲地區的傳播研究發展：三個中國社會的啓示〉，臧國仁主編，《1993 年中文傳播研究論述》，台北：政治大學，頁 50。
- Adams, E. E. & J. V. Bodle (1998). Research presented at conventions: How well are women doing? *Journalism Educator*, 50(1), 14-22.
- Alberice, Ralph & M. Snow (1985). Database and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ERIC ED 267812.

- Cole, R. R. & T. Bowers (1973). Research article productivity of U. S. journalism faculties. *Journalism Quarterly*, 50(2), 246-54.
- Dupagne, M. (1993). Gender differences in predicting productivity of faculty. *Journalism Educator*, 48(1), 37-45.
- Dupagne, M., J. W. Potter, et al. (1994). A content analysis of woman's published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65-1989. *Journalism Quarterly*, 70(4), 815-823.
- Fedler, F., A. Carey, et al. (1995). Journalism's status in academia: A candidate for eliminatio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53(2), 31-39.
- Greenberg, B. S. & J. C. Schweitzer (1989). Mass communication scholars' revisited and revised. *Journalism Quarterly*, 66(3), 473-475.
- Hickson III, M., D. W. Stacks, et al. (1992). Active prolific female scholars in communication: An analysis of research productivity. *Journalism Quarterly*, 40, 350-356.
- Ryan, M. (1983). Evaluating scholarly manuscripts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s. *Journalism Quarterly*, 59(2), 279-85.
- Schweitzer, J. C. (1988). Research article productivity by mass communication scholars. *Journalism Quarterly*, 65(2), 479-484.
- Schweitzer, J. C. (1989). Faculty research expectation varies among universities.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44(2), 45-49.
- Soley, L. & L. N. Reid (1983). Advertising article productivity of U.S. academic community. *Journalism Quarterly*, 50(4), 454-469; 542.
- Vincent, R. C. (1984). Broadcast research productivity of U.S. Communications programs. *Journalism Quarterly*, 61(4), 840-851.
- West, Charles K. (1978). Productivity ratings of institutions based on publication in the journals of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1970-1976. *Educational Researcher*, 7, 13-14.

The NSC Research Proposals in Communication Study, 1966-2000: A Preliminary Analysis

Pailin Chen*

ABSTRACT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NSC) is one of the major funding sources for the communication researchers in Taiwan. This article tends to present a map of how the NSC-granted researchers are like during 1966-2000. For this purpose, the author accessed the NSC database to retrieve, verify and analyze the records of the granted proposals in the period.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number of NSC-funded projects increased sharply during 1996-2000. More communication researchers than ever used this source of funding. In addition, the topics of the proposals turned diversified in the period. However, the author found that “research divide” existed in the community.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granted projects came from a small portion of the members in the research community. The portion of administration/business driven projects were also found increased. Finally, it was argued that the lack of team-working among the project participants make it difficult now an then to develop the long-term, large-scale researches.

Keywords: research proposal, funding, databases analysis,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 Dr. Pailin Che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